

读史阅世

史海钩沉

# 福州闽越国文化遗存寻踪

□甘满堂

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已有2200多年历史。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越王勾践后裔受封闽越王,兴建“冶”城,开始了福州最早的城池建设。闽越国是福建历史上地方割据政权中时间最早最长,也最为强盛的诸侯国。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闽越人效法中原文化,从而创造出灿烂一时的秦汉闽越古国文化。但随岁月流逝,闽越国文化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当前在福州寻觅闽越国文化,除了到博物馆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寻觅闽越国文化遗踪呢?如果放眼福州城外,从诸多祭祀先王先贤的古庙就能找到答案。

《礼记·祭法》中的规定:“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条祭法规定社庙祭祀对象必须是有功于国家和社会的帝王将相与民间乡贤。闽越国国王与贤臣业绩也因民间社庙祭祀而得到传承。

根据笔者在福州多年的田野调查,福州地区现存境庙之中以闽越国国君、太子为主神的有两大系列:汉闽越王无诸庙系、白马尊王庙系,另外还有分庙较多的吴颜庙系、蔡十九尊王庙系等。其中,以白马尊王为主神的境庙最多,在福州地区有500余座,其次是汉闽越王无诸庙,在100座左右。

福州鼓山鱗溪白马王庙被海峡两岸信众共奉为白马王信俗的祖庙,它是福州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庙之一,在唐宋时期就列入官方祭典,1961年被市政府列入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该庙供奉闽越王无诸之孙驺寅,闽越王郭的第三子,因好骑白马,故号白马三郎。传说当年鼓山鱗溪有一条恶鱗,长三丈,残害百姓,白马三郎将它射杀,但自己与马也被鱗尾缠住拖入水中同归于尽。后人感念白马三郎的功德,建白马王庙奉祀纪念。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梁克家编撰成书的《三山志》是福州现存最早最全面的地方志。该书设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等条目,内容广博而又详细。《三山志》在“公廨·祠庙”中,位列前三位的祠庙分别是武烈英护镇闽王庙,位置在今天南台大庙山,祀汉闽越王无诸,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32年—公元前192年,创建治城,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明德赞福王庙,位置在今天西湖,祀汉闽越王邹郢,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55年—公元前135年;善溪冲济广应

灵显孚祐王庙,即鱗溪白马王庙,奉闽越王无诸之孙驺寅,闽越王郭的第三子,书载:“昔闽粤王郭三子有勇力,射中大鱗于此潭,其长三丈,土人因为立庙,号白马三郎。”

该书在“明德赞福王庙”中还载,在唐大历以前,福州官方祭祀的祠庙有四座:南台武烈英护镇闽王庙、鱗溪冲济广应灵显孚祐王庙、西湖明德赞福王庙、城隍庙(祀城隍)。现在位于城中的南台大庙山汉闽越王无诸庙、西湖汉闽越王邹郢庙都毁于民国与解放初期,已无踪迹可寻。福州城隍庙在“文革”时全部被毁,现在重建的城隍庙已非旧址,且規制也很难与原庙相比。四大古庙,只有鱗溪白马王庙因位于城郊鼓山下,得到保存,信俗也传承不绝。

唐肃宗年间,鱗溪白马王庙还成为福州官方祈雨圣地,白马王驺寅还被尊为“司雨之神”,也因祈雨灵验,白马王驺寅曾在唐肃宗时期5次受朝廷敕封。曾在福州任职的蔡襄、曾巩等文化名人也都曾到这里祈过雨,并留下了祈雨诗文。梁克家《三山志》对此记载非常详细。

唐贞元十年(794年),福建观察使王翊到白马王庙祈雨有应,天降甘霖,于是新其庙,扩其宇,亲自祭谢。大和元年(827年),观察使王仲方到白马王庙祈雨回程,路过圣泉寺,雨已至,遂题诗:“入门池色净,登阁雨声来。”咸通六年(865年),观察使李璠奏封驺寅为“龙骧侯”。

五代后梁贞元元年(915年),闽王王审知奏封驺寅为“弘润王”。

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早,郡守蔡襄自为文祈雨,读毕大雨,修葺其庙。熙宁八年(1075年)敕封驺寅为“冲济广应王”。元丰六年(1083年)春,太守刘瑾入庙祈雨,其摩崖石刻尚存。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增封“灵显”。绍定五年(1232年)又加封“孚佑王”。淳祐八年(1248年),郡守陈垲祈雨有验,改鱗溪为善溪。曾巩所作的《福州鱗溪祷雨文》和蔡襄所作的《祈雨记》作为宋代石刻,仍保留在白马王庙后的溪崖上,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迹。

明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明万历年间王应山撰写的《闽都记》、清代林枫撰写的《榕城考古略》都记载了白马三郎为人除鱗怪的故事。清乾隆年间曾有戏剧《白马尊王》,剧情在叙述白马三郎鱗溪射鱗的故事时,将鱗鱼精编成龙王之女石善公主的化身,与白马三郎有前世姻缘,在搏斗中同归于尽后,成为神仙眷侣,三郎被封为白马尊王,石善公主被封为英德夫人。

清代乾嘉时期的小说《闽都别记》在演绎白马王庙故事时,将其与西洋红毛番拉上关系。该书第353回说,福州发生巴蛇食人的事件,当地军民都没有办法杀死巴蛇,只好张榜悬赏。这时在闽江港口避风的“红毛番人”揭榜,设计用炸药炸死巴蛇。红毛番人还将蛇身搬上船当药食,原来蛇肉、蛇骨都是宝。此外,临走时还盗走鱗溪白马王庙中鱗鱼头制成的香炉。这时福州人才知道红毛番来福州的真实目的是想盗白马王庙的香炉,至于来福州避风,只是借口。

福州“红毛番”一般指欧洲荷兰人。至于荷兰人不远万里来福州盗取白马王庙香炉的原缘,编故事者可能认为鱗鱼头制的香炉有平风镇浪的神效,可保航海安全,声名在外,引起红毛番垂涎。鱗溪白马王庙事迹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都知道了,可见影响很大。

现存鱗溪白马王庙重修于同治四年(1865年),属于鱗溪村村庙,庙内尚存有清同治四年重建的“鱗溪白马尊王祖殿”碑刻可见证。1949年后,政府将庙改设为鱗樟小学,一直到1980年。1981年,白马王庙才被鱗溪村民众收回,并有翻修。

现白马王庙为前厅后殿,中有拜台天井的四廊三进土木结构式仿古建筑。庙前厅有戏台,天井左右侧建有钟鼓楼,后座大殿供奉白马王爷和夫人,另外有陈靖姑等配祭神。每年的二月初二是白马王的神诞,鱗溪村都会举办隆重的庆宴,献戏酬神,热闹非凡。

由于鱗溪村前十年已拆迁,村民被安置分散,最近十年已没有举办游神活动。目前在福州、宁德沿海地区,将白马王庙奉为境主大王的村庙有五百余座,它们都以福州鱗溪白马王庙为祖庙,明清时期还随福州移民播迁到台湾岛。在连江县马祖岛上,白马王是仅次于妈祖的民间信仰,有19座供奉白马尊王的官庙,它们都以福州鱗溪白马王庙为祖庙,并定期来鱗溪祖庙进香。

福州地区汉闽越王庙系统也有近百家,但建庙历史远不及鱗溪白马王庙悠久。汉闽越王庙皆主祭闽越王无诸,但祭汉闽越王邹郢的庙则没有发现,也许闽越王无诸名气太大,遮蔽了他的后人邹郢,故所有闽越王庙都是祭祀无诸。

闽侯县荆溪镇永丰村的汉闽越王庙为现存闽越王庙中建筑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庙。该庙始建于南宋理宗年间,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现存为清代建筑。2011年因修

建福州三环路淮安大桥及永丰互通,古庙按照原样迁移迁建于东侧山麓新址之上。闽侯县洋里乡仙洋的闽越王庙为清代建筑,距今至少二百年。由于福州大庙山上的汉闽越王庙已不存在,作为村庙的汉闽越王庙就没有赴祖庙进香的习俗,因此汉闽越王庙系统内的联络就没有白马王庙系统强。

福州市台江区中选村吴颜庙,主祭汉代闽越王部将吴阳和颜平圣,两人以勇猛和嗜酒善饮闻名,因奉命寻找在福州鱗溪射鱗牺牲的王子白马三郎未果,双双坐化在合江中选村。当地民众立庙祭祀,吴颜二将被民间奉为“酒神”,解放前,合江吴颜庙游神规模盛大,也是合江一景。合江中选吴颜庙还有一座分庙红星翁八帮吴颜庙。两庙在改革开放后也恢复庙会活动,吴颜爷酒神信仰习俗在2015年成功入选福州市级第四批非遗名录。

在闽侯县荆溪镇厚村有一座蔡十九尊王庙。据庙内碑刻记载,蔡十九尊王为闽越王无诸第十九孙,闽越国被灭后,先人不想北迁江淮,被赶下永定,成为蛋民,以草为记。蔡十九尊王因有功于民,死后得到民众祭祀,就以“草”加“祭”为姓——“蔡”,故得名蔡十九尊王。由此碑刻来看,闽越人与闽江流域的蛋民在族源关系上密切。厚村蔡十九尊王也有一座分庙,位于闽侯上街镇建平村,庙名四境庙,每年都有庙会游神与演戏酬神活动。

由上来看,汉闽越国最著名的国王、王子与将相都在福州村庙(境庙)之中尊为主神得到祭拜,闽越国文化遗存在福州丰富的村庙文化中得以保留与传承。汉闽越王无诸庙、白马尊王庙等都是福州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当前应当加以保护,如果能适当地进行文旅开发,既可弘扬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作贡献,也可以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与榕台民间交流作贡献。

在众多闽越系列庙宇中,鱗溪白马王庙无疑是汉闽越国文化遗存的最重要代表,其所在的鱗溪风景区可以打造成为闽越文化遗址公园,让闽越国文化在福州有集中展示的空间。有关闽越国文化的碑刻、闽越人的蛇崇拜信仰等都可以在公园内集中陈列。周边被拆迁的村庙也可以集中安置到公园内,目前白马王庙周边已安置两座被拆迁的村庙,它们在建设风格上要与白马王庙统一,共同打造闽越文化遗址公园。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社会学系)

# 泉州泉郡接官亭

□孙群 彭惠妮 文/图



泉郡接官亭位于泉州市鲤城区临江门西面的笋江公园旁,始建于南宋。据文献记载,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时,临江门外有甘棠、棠阴、龟山3座石桥,桥东处有古接官亭,供奉观音菩萨,又名观音大士亭,具儒释道三家文化内涵,现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及泉州古城示范区。

接官亭坐落于晋江东岸凸出的平原上,选址较为特殊。首先,寺庙坐西南朝东北,濒临晋江,西侧就是历史悠久的笋江桥。笋江桥建于北宋祐祐元年(1049年),又名通济桥,俗称浮桥,为古泉州城十八景之一,附近有石笋古渡口。

其次,临江门始建于南唐,是泉州七大城门之一,作为古代从南安等地进出泉州城区的必经之道,这里是官员迎接上级官员之处。在此建寺不仅可方便过往官员休息,而且还可“镇住”晋江里的“蛟龙”,保护行人与船舶。

再次,这里是清源、紫帽两山脉的交汇处,传说是“神女坐机”之穴位。其中,甘棠、棠阴和龟山3座石桥与道路连成一条直线,穿亭而过,为织布机上的织线;亭外古井为浣纱井;接官亭正好坐落于机座之位,操机而织;平时人车往来,如同织梭来回移动;浩浩荡荡的晋江水,犹如织布机的声音。于是,接官亭及其周边景物共同构成一台完整的织布机,充满活力,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接官亭采用中轴线布局,轴线上依次为



北山门、主殿(观音亭)、中殿(圆通宝殿)、大雄宝殿,西侧为客堂,东侧为黄甲元帅殿、僧寮、藏经阁、功德堂,西北向有西山门。

接官亭正殿保留清代“皇宫起”建筑风格,屋顶覆盖红瓦,屋脊装饰剪粘,其余殿堂为近年重修或新建的红砖白石木构官式建筑,具泉州民居特色,屋脊饰剪粘和泥塑。

主殿(观音亭)建于清代,为闽南地区红砖白石木构“皇宫起”建筑,占地面积5880平方米,建筑面积746平方米,形制较为特别,由前后左右中五亭(中亭、前亭、后亭、左拜亭、右拜亭)组成,形成“十”字形结构,近年修缮时高度增加约1米,但仍保留原有形制。

其中,中亭与前后两亭组成主殿,单檐歇山顶,正脊上雕双龙护塔,两端燕尾脊高翘,脊饰饰两只云龙,垂脊牌头立金剛像,战脊两侧雕花卉,翼角饰卷草纹。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插梁式木构架,彻上明造。明次间通透无门。墀头彩画金鱼摆尾、喜上眉梢,上方立一只戏狮,水车塔彩绘二十四孝图。背面红砖墙上嵌一刻有“佛”字的深灰色石碑,两侧各开一石门,门上书“消灾”“免难”。

中殿(圆通宝殿)建于清代,1956年被洪水所毁,20世纪90年代重建,红砖白石木构建筑,正前方为门厅,两侧廊庑,后为叩殿。

接官亭石塔建于清代,五轮式石塔。三层四角形台基。塔座为单层须弥座,束腰六边形,刻“卍”字和宝瓶图案,正面辟一佛龛,转角施三段式竹节柱,上枭与上方均素面。塔身两层,一层圆鼓形,上下枋刻仰覆莲瓣,中间瓜楞形;二层卵形,辟一佛龛,雕一尊结跏趺坐佛像。八角攒尖顶,檐角高翘,三层相轮式塔刹。

接官亭北山门外建有大型放生池,四周树木茂盛,池正中就是笔直的山龟石塔。主殿旁边有小型水池,池旁筑假山石。正殿前有有多株高大、茂盛的榕树,其中有株300多年的古榕,高大古朴。其他植物还有柏树、文竹、棕榈树等。庭院中还建有一座重檐八角攒尖顶亭。

接官亭东侧就是开阔的石笋公园,一派原生态景观,种植刺桐、木棉、龙眼、榕树等。原内有著名的石笋,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南宋时王十朋有诗曰“刺桐为城石为笋”。附近还有山川坛、甘棠桥、棠阴桥、石笋古渡、古浮桥遗址、溪后古地、笋江公园等景点。

人物、蛟龙、花鸟图,梁枋上雕二十四孝图。殿内两侧墙壁布满影雕书法作品,多为历代名家描写接官亭的诗句,如“风光旖旎接官亭,芳草三洲紫帽屏。冠盖往来皆过客,多名宦史垂青”,另外还有影雕接官亭全貌和宋代古迹笋江桥原貌图。

# “乐海才子”江文也

□宫婉舒 王丽君

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同步设有国际艺术竞赛的情况下,一首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文艺竞赛管弦乐作品银质奖”,成为第一首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作品。这首乐曲的创作者就是出生于台湾的音乐家江文也,《台湾舞曲》是他在1934年写出的处女作。

江文也(1910—1983年),原名江文彬,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出生于台北大稻埕,1916年跟随父亲举家迁居厦门,1918年进入厦门旭瀛书局上学,1922年母亲病故后前往日本求学,1938年秋定居北京,1983年因病逝世,留下未完成的交响乐遗作《阿里山的歌声》。

20世纪30年代,江文也连续获得四届全日本音乐比赛作曲奖、一项“新乐国际作曲音乐比赛”奖、一项奥运会音乐奖、两项意大利威尼斯现代音乐节比赛奖,共8首作品获奖,加上1932年和1933年的两次声乐赛,短短数年连获十项奖项,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首位享誉国际的作曲家,堪称破纪录之举!

20世纪40年代,有三位中国作曲家各自创作《第一交响曲》:江文也《第一交响曲》(1940年)、冼星海《第一交响曲》(1941年)、马思聪《第一交响曲》(1942年),可见江文也是最早完成此部作品的,然而由于总谱遗失最终未能流传于世。1948年春,江文也完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以中文为歌词的《弥撒曲》。

江文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热爱、维护、坚持与信仰,他精通西方文化与西方音乐,能娴熟运用20世纪前卫的技法,却忠于中国音乐的民族传统。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除江文也之外,似也再难寻得第二人!江文也可考的管弦乐作品包括管弦乐21首、室内乐11首、钢琴26首、舞剧6出、歌剧3出、声乐20余首、宗教音乐17首,以及其他类型和散佚作品等,共计创作130余曲。在创作活力上,作品产量位居近代中国第一。在中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史中,他也是同期音乐家里钢琴曲目创作最多的。兼之,获奖次数亦是近代中国音乐史第一。

江文也落籍的台北淡水镇三芝乡是早期闽人赴台开垦的聚居地之一,那有许多原籍永定高头的福建移民,迄今仍认祖归宗并设立祖祠。江文也的父亲江蕴鏊是晚清闽省秀才,后赴台湾从事航海生意,并从三芝乡的老厝迁出到大稻埕购置新房,江文也便在此出生,其母郭氏是来自花莲商人家庭的一个有文化且热爱音乐的女子。

江文也自幼便跟着为喜海南管音乐的母亲逛庙会、听圣曲。在这样一种闽台文化交融与共的氛围熏陶下,江文也很早就显露出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许多地方的山歌、戏曲小调都耳熟能详。台湾音乐的民间乡土气息为他日后自觉深化民族音乐风格的创作实践埋下了种子。

日本侵占台湾后,许多早期赴台的同胞纷纷内渡,重返祖国大陆。作为清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海港商贸城市厦门,成为台湾同胞在大陆最集中的落脚点。江蕴鏊出于经商需要,也携家眷在厦门水仙宫后三十六崎顶一带定居,那里是当时厦门人文荟萃的地方,江文也在6岁时随之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此后仅在1934年8月时因巡回演出而返台一次。

在厦门期间,江文也先是受过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直到1918年才进入由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在厦门开办的专门针对台籍学生的日文学校旭瀛书院就读。厦门的生活经验给江文也提供了丰富的音乐灵感和创作素材,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江蕴鏊作为有名声的雅士,经常能聚集起文人墨客谈论文化艺术,他们唱诵的南音北调持续洗礼着江文也的音乐情愫;另一方面是担任《全闽新日报》的三伯父居住在鼓浪屿,江文也常常跑去岛上,又深受到西洋乐器的熏陶,对乐理曲谱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使得江文也从从小就吸收了中西音乐的文化底蕴。

1923年8月,江文也前往日本长野县求学,在厦门的这段成长历程虽仅占江文也人生的一小部分,却是江文也形成祖国意识的情感纽带;1933年久病卧床的父亲江蕴鏊也随之离世,厦门成了父母内渡大陆的安居之地与最终的长眠之处,是江文也血缘亲情的根脉。更关键的是,闽台两地血液于水的经验交融也让江文也找到了祖国情感的心灵基点。

1936年正值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并以处女作《台湾舞曲》获得多个奖项名扬海外之时,江文也受音乐家齐尔贝在北京与上海演奏的同行邀请,在离开厦门的10余年后再度重返祖国。这次见闻与经历让江文也的中国血脉和祖国情感喷涌而出,难掩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心脏跳动的鸣声,我的全身有如市街的喧扰般沸腾的要洋溢出来,我竟能在憧憬许久的古都大地上毫无拘束地疾驰着。”

这样的赤子之心让江文也找到了身份认同之归属,最根本的音乐语言的源头,他毅然决定离开在日本乐坛创造的辉煌返回祖国。1938年,江文也亦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何政和的邀请,担任作曲与声乐教师,从此定居北平(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已入职于天津筹办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江文也在教师联席会上即兴表演了一曲《厦门渔夫舞曲》,这首作品以厦门为主题,根据福建民歌改编,是对厦门渔夫劳作生活的描述。1950年,江文也潜心整理和吸取闽台两地的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大型交响诗《汨罗沉流》,以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并谱写了钢琴套曲《乡土序诗》,描写台湾、闽南各个节令的喜悦气氛。可见,闽台乡音已融入江文也的骨血,滋养着他不断探索民族音乐的创作风格。

闽台文化成为江文也一生音乐创作的源泉和专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他的个人回忆中提到,“1963年,听了院长关于加强中国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的报告会,动手整理自己近30年来收集的台湾、福建等地民歌。”他创作的《台湾舞曲》《白莺的幻想》《台湾山地同胞歌》以及改编台湾民歌的灵感,也都取材于在厦门的经验沉淀。清代《台湾府志》中所说可佐之:“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俗谓厦即台,台即厦。”作为一个出色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江文也在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圣咏作曲集》(第一卷)中深情地表达了对祖国音乐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爱中国音乐的对祖国音乐的矢志不渝之情:‘我深爱中国音乐,每当人们把它当作一种遗物看待时,我觉得很伤心。遗物不过是一种古玩似的东西而已,虽然是新奇好玩,可是其中并没有血液,没有生命,传统可不然!就是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精神——生命力。本来它可以创造的,像过去时的贤人根据传统而在无意识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加上传统似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这传统。”